

# 【武成王】之谜与《封神演义》的叛逆精神

□ 陈洪

壹

《封神演义》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大神魔小说之一，又是近几年影视改编的大热门。其基本故事情节，大家耳熟能详。不过，表层之下的思想内涵还有深入探索的余地。

《封神演义》的大框架是两条线索的交织，即人世间的武王伐纣、改朝换代与仙界的正邪相争、历劫封神。这两条线索既有关联互动的情节，也有各自独立发展的内容。相应地，小说的人物形象也就形成了“人界”为主与“仙界”为主的两大群体。“仙界”为主的，如元始天尊门下的十二弟子，通天教主门下的魔家四将之类。这类形象的特点是基本与“人”的生活毫无牵连。“人界”为主的，如西伯侯、周武王、商纣王、比干等，这类形象的特点是与“仙界”的争端毫无牵连，喜怒哀乐全是以凡人的样貌展现。

诚然，也有介乎二者之间的。但大体来讲，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“人”“仙”两分是其基本构架。

“人界”之中，全书着墨最多的是黄飞虎。他的姓名在全书中出现六百余次，有关他的文字超过六万，甚至超过了横跨两“界”、“封神”主角的姜子牙。另外，不仅他本人是故事的重要人物，作品里还写了黄氏家族的一代成员。重要的如黄天化。他是黄飞虎的儿子，拜在道德真君门下，一度是姜子牙麾下主要战将，屡立大功，如消灭劲敌魔家四将等，姓名在全书出现近两百次。还有黄飞虎的父亲黄滚、弟弟黄飞彪、妹妹黄妃、夫人贾氏、儿子黄天祥等。用于这些人的笔墨详略不一，但也各有表现。所以，作品中借杨戬之口评价黄家为“黄氏一门忠烈”。

如此牵三挂四写一个家庭，《封神演义》中仅此一例。

纵观全书，黄飞虎的故事有三个高潮：一个是救殷郊、殷洪，一个是打击苏妲己，一个是与纣王决裂，反出五关。

如第一个，纣王听信妲己谗言，先是害死了姜皇后，然后又要斩草除根杀死两个儿子殷郊、殷洪。两位王子逃上大殿向黄飞虎求救，于是就开始了黄飞虎的故事。这一大段的回目是“方弼方相反朝歌”，其实从内容看，改为“黄飞虎私放二殿下”更为贴切。故事起伏跌宕，也可谓摇曳多姿。而这一番曲折变化的情节，作者足足写了一万余字，可最后终结于两位王子又被捉回，押上刑场斩首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删去这一万多字，对整个故事的叙述还没有丝毫影响。

那么，作者为什么要耗费这一番笔墨呢？这样写的效果何在呢？

其实，作者看似信马由缰，转了一个大圈子，使故事又回到了原地，但在“兜圈子”的过程中，一个人物的形象——包括他的身份、性格、处事方式，树立在读者眼前了。这就是黄

飞虎。这一万多字，从殷郊、殷洪的角度看，故事几乎是停在了原地；但从黄飞虎的角度看，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“无中生有”地开始树立起来了。接下来两个高潮是与苏妲己、商纣王的直接冲突。黄飞虎被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，终于与纣王刀兵相见：

飞虎只得催动神牛，一龙三虎杀在午门。……纣王抵敌不住，刀尖难举，马往后坐，将刀一拖，败进午门。

这一大段，作者又极尽心理描写之能事，刻画了一个“七世忠良”“官居王位，禄极人臣”的朝堂重臣如何在面临生死抉择时，终于走上“反叛”之路，义无反顾地反出五关，投向了敌国。读者至此，欲不叹息，欲不反思，岂可得乎？从文学效果看，这一大段描写，与《水浒传》写林冲“风雪山神庙”差可比拟。

接下来，是黄飞虎与商纣暴君决裂的高潮戏——反五关。黄飞虎反五关，作者足足写了三万多字，是全书“人间”故事的极致。

读者看到此处，不免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：这样一个黄飞虎，由何而来？

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，是因为他在书中的形象不同于通天教主之类“仙界”人物那样，自然具有向虚塑造的因素；还因为他在书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，是商、周两个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；也因为作者在他身上用了这么多笔墨，使其不仅“戏份”出众，更是少有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……

那么，他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样一个具有浓烈“现实”感的人物，我们到历史文献中查找，竟然毫无踪影！

也就是说，他不同于姜子牙，不同于比干，甚至不同于南宫适、散宜生这些轻笔淡墨的人物，完全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。



《姜子牙》张旺

贰

为回答这一问题，我们只能把视线移向文学的书写中。

原来，“黄飞虎”这三个字早见于另一部话本小说《武王伐纣平话》（下称《平话》），其中写道：

纣王大喜，问曰：“卿是何人也？”佳人奏曰：“臣是我王臣之妻。”纣王曰：“何人妻也？”

“臣是黄飞虎之妻耿氏。”

……君不识我夫南燕王？”

纣王大怒，把耿氏醢为酱，封之一盒，令殿使送与柘城县南燕王……黄飞虎便起

三万雄兵，直到朝歌至近，下寨。……姜尚奏曰：“臣启陛下，用兵五千，用将五人，来日活捉黄飞虎。”纣王大喜。

从故事梗概看，《封神演义》由此生发，当无疑义。不过细分析，二者的差异还是很大的，有些甚至带有根本的不同。

首先是身份不同。《平话》的黄飞虎是所谓“南燕王”，若从文中的“柘城县”“起三万雄兵，直到朝歌至近，下寨”，这个“南燕”似乎还有藩属“外国”的嫌疑。这样一来，黄飞虎与纣王反目成仇的意味，便与《封神演义》“逼反忠臣”“自毁干城”的内涵完全不同了。

其次，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看，《平话》中黄飞虎的反抗，直接的后果是引出了姜子牙，姜子牙从此走到了舞台的中心。而黄飞虎自动销声匿迹，直到故事终结才又从遥远的南燕过来露一次面：

有人报曰：“西南见一队

军，拥一员将。”至近下寨，令一小卒，来见太公，言曰：“南燕王黄飞虎至，愿助气力伐纣。”太公闻言，奏武王曰：“有黄飞虎至助大王伐纣者。”武王大喜，便封为先锋招讨大将军。南燕王遂合兵伐纣。

《平话》的这个“黄飞虎”，自身在故事中似乎没有多大价值，几乎就是姜子牙出场的一个引子。由于颇有赘指的感觉，似乎可有可无，所以“伐纣”系列中的《列国志传》就把这个形象完全舍弃了。

我们如果把视野更放宽些，把方志、笔记也爬梳一通，会发现连蛛丝马迹都少得可怜。仅见者只有《卫辉府志》：“黄飞虎洞，在胙城县治西，相传纣时黄飞虎所筑。疑即飞廉也。”这很可能是小说流行后，当地三家村的“学者”的附会。把大忠臣解释成“大恶人”飞廉，既显露了冬烘的可笑一面，也可看出人们在找不到“黄飞虎”历史依据时的急切不安。

这种焦虑同样流露在学者的笔记杂著中，如清人昭梿的《啸亭续录》：“钟伯敬《封神演义》荒诞幻渺，不可穷诘。然皆暗指明事，以神宗为纣，郑贵妃为妲己，光宗常洛为殷洪王，恭妃为姜后。张维贤为闻仲者，以其行居次也。朱希忠为黄飞虎者，姓皆色也。”这个朱希忠是明嘉靖朝人物，官封成国公。只因为姓氏有颜色之义，便被扯到黄飞虎身上，当然更加匪夷所思了。

《封神演义》中的黄飞虎与《平话》中的黄飞虎相比，除了上述差别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同是各自的头衔。《平话》中的黄飞虎头衔是“南燕王”，似乎是个藩王的称号。而《封神演义》中的黄飞虎，头上则顶着个闪亮的大帽子：“武成王”。这个头衔是朝堂上元戎之首：

帝乙在位三十年而崩，托孤与太师闻仲，随立寿王为天子，名曰纣王，都朝歌。文有太师闻仲，武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；文足以安邦，武足以定国。

武王问子牙曰：“黄将军在商官居何位？”子牙奏曰：“官拜‘镇国武成王’。”武王曰：“孤西岐只改一字罢。便封‘开国武成王’。”

这个“武成王”，在商是“镇国”，在周是“开国”，实在是国之干城、柱石。这样的头衔，这样的待遇，连权倾朝野的闻太师、主持大计的太公望都不曾享有！

那么，这个尊崇之至的头衔是哪里来的呢？作者舍弃了原有的“南燕王”，改换成这个“武成王”，是随手虚构呢，还是另有出处呢？

我们不妨到历史上爬梳一番。

原来，“武成王”是历史上颇不寻常的头衔，围绕这一头衔曾在几个朝代掀起过政治“浪花”，而这又是与商周之争关系匪浅。

除了战国时期燕国有过一个“武成王”之外，历史上的“武成王”一直是姜太公的“专利”。

唐肃宗上元元年，平定安史之乱到了决定性时刻，朝廷一边调兵遣将，一边乞灵于神祇，于是下了一道诏书，诏曰：

定祸乱者，必先于武德；拯生灵者，谅在帝王贞。周武创业，克宁区夏，惟师尚父实佐兴王。况德有可师，义当禁暴，稽诸古昔，爱崇典礼。其太公望，可追封为武成王。有司依文宣王置庙。

这道诏书包含四层意思：一层是祸乱当头，应大力崇尚武德；二层是太公望——姜子牙武功卓著，又有德义；三层是把他头衔升格，封为“武成王”；四是作为官方的祭祀对象，一切规格与文宣王孔子等同。

原本在唐太宗贞观年间，在姜子牙垂钓的磻溪建了“太公庙”，到了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，又下诏扩大范围，“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，以张良配飨，春秋二时仲月上戊日祭之。”而唐肃宗上元年间的诏令则有点“病急乱投医”的味道，似乎劈头先强调必要性：“定祸乱者，必先于武德。”也就是说，给姜太公“升格”——包括“尚父”封为王爵及祭祀规格并列于孔子，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。

于是，在“非常时期”结束后，这两项举措就成为了争议的内容。

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历代都有对“武成王”不以为然的声音，而唐朝与明朝更是有集中且激烈的辩论。姜太公荣膺“武成王”的称号二十八年之后，唐德宗贞元四年，一批官员联手提出撤掉此封号的意见。其中如左司郎中严某的奏章云：

贞观中，以太公兵家者流，始令磻溪立庙。开元渐著，上戊释奠礼，其进不薄矣。上元之际，执事者苟意于兵，遂封王爵，号拟文宣。彼于圣人非伦也。

于是，在“非常时期”结束后，这两项举措就成为了争议的内容。

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历代都有对“武成王”不以为然的声音，而唐朝与明朝更是有集中且激烈的辩论。

姜太公荣膺“武成王”的称号二十八年之后，唐德宗贞元四年，一批官员联手提出撤掉此封号的意见。其中如左司郎中严某的奏章云：

贞观中，以太公兵家者流，始令磻溪立庙。开元渐著，上戊释奠礼，其进不薄矣。上元之际，执事者苟意于兵，遂封王爵，号拟文宣。彼于圣人非伦也。

谓宜去武成王号，复为太公庙。

这是从祭祀的历史来论，认为本朝从贞观到开元，建庙，立祀，扩大范围，对姜子牙已经很够意思了，“封王爵”“拟文宣”都是权宜之计，应该恢复常态，予以撤除。

刑部员外郎陆某则从根本上质疑姜太公的伦理价值：

武成王，殷臣也。纣暴不谏，而佐周倾之。夫尊道者，师其人。使天下之人入是庙，登是堂，稽其人，思其道，则立节死义之士安所奋乎？圣人宗尧舜，贤夷齐，不法桓文，不赞伊尹，殆谓此也。武成之名与文宣偶，非不刊之典也。武王曰：“孤西岐只改一字罢。便封‘开国武成王’。”

他的逻辑就是从“君君臣臣”的纲常出发，认为姜子牙既然做过殷商的臣子，就应该尽忠于商王朝。无论纣王如何昏暴，也不能辅佐周武王推翻他。陆某直言立庙封爵都是做给活人看的，是树立行为的楷模。表彰了姜子牙，会削弱人们对君主的忠诚程度。他还把这一评价标准普世化，提出齐桓公、晋文公，甚至伊尹都不能褒奖，应褒奖的是伯夷叔齐那样的遗民。所以，他提出把姜子牙的待遇从王爵退回到磻溪的钓鱼叟，“斯得矣”。

严、陆的主张有固守礼制、伦常的原因，也有文官武将的利益之争，所以，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联名坚决反对，他们的奏章讲：

兵革未靖，宜右武以起忠烈。今特褒损，非劝也。且追王爵，以祠祀为武教主，文武并宗，典礼已久，改之非也。

很有趣，这批武将的逻辑与上元时如出一辙，强调国家并未安定，武装力量绝不能削弱，如贬损了“武成王”，对社会的价值取向将产生消极影响。何况，“文武并宗，典礼已久”，没有必要变动更改。

今天看来，这表面上似乎是一个礼仪文化的问题，其实背后的水深水浅大有名堂。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，包括各自相关的价值体系、舆论导向，都与这个一两千年前的古人评价发生了联系。于是，最高统治者只能做出折中的裁决：“以将军为献公，余用紳服。自是以上将军、大将军、将军为三献。”也就是说，对武成王的祭祀规格降低到与孔子相当。

宋、金、元对“武成王”的祭祀，虽有个别异议，但没有升级到朝堂之上。

而明朝建立之初，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。

据《明史·礼志》：

洪武二十一年，令每岁郊祀，附祭历代帝王于太庙殿，……初太公有武成王庙，尝遣官致祭，如释奠仪。至是，罢庙祭，去王号。

按照这个记载，姜太公的王冠是在洪武二十一年摘掉的，其原因是规范皇家祭祀，统一标准。但是，也有同样为官方文献的，所记有所不同。如《续通志》：“明初，武成王庙置官祭，如释奠仪。太祖洪武六年，以太公从祀历代帝王庙，遂去武成王号，罢其庙祀。”如照此说，则朱元璋立国不久，就匆匆忙忙摘掉了姜太公的“武成王”封号。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则说：“秋七月，有司请立武成王庙。上曰：‘文武非二涂也。’太公从祀帝王庙，罢其旧

祀。”这是记载了朱元璋的罢黜“武成王”的理由：不应该文武分立，要文武全才，所以不必树立“宣武”的楷模。

这当然是朱皇帝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实际上，朱元璋废黜“武成王”的祭祀，是与废黜孟子的祭祀，禁毁、阉割《孟子》